

阿尔及利亚 民族主义道路及其发展趋势

慈志刚 姚大学

内容提要 阿尔及利亚的民族主义产生于反抗法国殖民主义的斗争，以宗教、民族和国家为认同基础的不同民族主义相互竞争，决定了以国家为中心的民族主义在斗争中的主导地位。独立后，国家民族主义构筑出空洞的民族主义外壳，国家政治经历了极为重要的转折，民族主义进入重构时期。当前，民族主义日益呈现出其实质性内容更加充实、关注的焦点由政治转向经济，以及内涵更加多元化的发展趋势。

关键词 阿尔及利亚 民族主义 宗教 民族 国家

作者简介 慈志刚，内蒙古民族大学世界史研究所研究生（通辽 028043）；姚大学，内蒙古民族大学世界史研究所所长、教授（通辽 028043）。

复杂的历史背景与地理环境使得阿拉伯世界民族、宗教与国家的无法统一，作为民族主义的动员对象和建构民族主义社会基础的群众，同时具备了阿拉伯、伊斯兰和国家3种不同属性。在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精英通过意识形态的引导，使民众确认自己的社会身份，而人们对统一身份的追求又将意识形态转变为民族主义运动。在民族主义旗帜下，不同阶级、阶层和集团的利益关系谋求最广泛的认同。不同的政治、文化认同会促使出现不同的政治实践，于是便出现了以宗教、民族和国家为认同基础的不同的民族主义运动。这三者间相互竞争，接受民众的抉择，构成了错综复杂且充满活力的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史。其中某一种属性占据主导地位，可能将其他二者边缘化，同时，产生的排他性又形成了对社会整体性的张力，影响民族的团结与稳定。

民族解放斗争道路的选择

1830年，载着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法兰西

坚船利炮打开了阿尔及利亚的国门。法国殖民者以血腥方式不断延伸它在这片安拉庇佑下的神圣土地上的权利，到1905年法国完全确立起在阿尔及利亚的殖民统治。作为有力回答，阿尔及利亚人民选择了民族解放斗争的道路，对殖民侵略与压迫进行了顽强的反抗。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解放斗争大体经历了以下两个阶段。

（一）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是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斗争的产生和发展阶段，也是其民族主义产生和初步发展阶段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以往地位显赫的部落首领，在法国人长期的直接统治下，如今已变成驯服的工具，而大部分宗教领袖也同法国人合作，以维护自己尚存的、区别于一般穆斯林的社会地位。”¹但在文化层面上，面对法国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强势，具有民族主义情感的知识分子从传统中寻找斗争的武器，希望以一种文化

¹ 吴云贵、周燮藩著：《近现代伊斯兰思潮与运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22~223页。

方面的“优越感”来保持或恢复民族自尊心,维护民族精神上的独立。民族主义者最早从受到西方“文化殖民”提出反抗的宗教界人士中产生,他们强调伊斯兰文化遗产的优良传统和本民族文化实体的伊斯兰特征。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一些宗教民族团体相继成立,表达了独立的民族主张。如1931年成立的“阿尔及利亚乌里马协会”就提出了“伊斯兰教是我的宗教;阿拉伯语是我的母语;阿尔及利亚是我的祖国”这样鲜明的民族主义口号。^①一些民族主义者相信“是语言和历史把阿拉伯民族联结成有内在联系的统一体”^②。他们坚持阿拉伯统一的乌托邦式梦想,却无法跨越现实的障碍,以至于它逐渐演变为一种策略性的工具,并为后来的国家民族主义者所用。这就是为什么殖民地时期阿拉伯民族主义作为共同的理想总在阿拉伯人心中萦绕,却无法形成强大的民族主义运动的原因。而另一些思想更为西方化和世俗化的民族主义者则主张实现民族独立,反抗殖民压迫,建立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在产生阶段,它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表现出与传统更为彻底的决裂。1934年法共阿尔及利亚联盟改组为独立的阿尔及利亚共产党,并制定了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斗争纲领。

宗教民族主义对于广大穆斯林自卑的民族心理给予了精神慰藉,并以一种非暴力形式存在。阿拉伯民族主义体现了阿拉伯民族的政治和文化诉求。国家民族主义自始就表现出对主权的强烈愿望,它与追求国家身份的政治实践紧密相关联。因此,三者表现出不同的政治和文化倾向,在反殖斗争上各行其是,国家民族主义失去从民族文化心理角度进行广泛动员群众的强大力量,阿拉伯民族主义超越了地方政治的现实需要而略显飘渺,而宗教民族主义失去国家的依托,只有把道义力量作为唯一武器。^③因此,在此阶段,民族主义文化倾向及殖民压迫造成人民反抗热情的低迷,形成了民族主义的温和表达方式。

(二) 二次大战的爆发是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斗争和民族主义发展的转折点

战争后期,费尔赫特·阿巴斯为首的民族主义者提出温和的民族独立的要求,遭到拒绝。1945年5月8日,阿尔及利亚举行了要求立即实现独立的和平示威游行,法国殖民当局进行残酷

镇压,有4.5万人遭到屠杀,大批爱国者被监禁或流放。温和的斗争似乎使独立变得更加遥遥无期,民族主义内部发生了分裂。1954年8月成立的团结与行动委员会(后改组为民族解放阵线),以世俗主义和社会主义为指导,积极准备武装起义,夺取国家政权。国家民族主义历来强调国家和民族的认同,主张具有更明确的独立性,暴力反抗其政治诉求的表达手段,这恰好适应了日益严峻的政治斗争的需要。他们宣传的“人人平等”、“社会公正”、“反对剥削压迫”的社会主义理想蓝图现实地触及了殖民苦难给广大人民造成的心理创伤。虽然各种民族主义在思想领域发生了分裂,然而在反对法国殖民统治和争取民族解放方面,存在着共同的目标,意识形态的统一性和纯洁性没有成为当务之急。^④随着战后的斗争形势发展,国家民族主义者逐渐成为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力量,引导人们的视野关注于国家疆域内的斗争,同时,也注意把阿拉伯民族性与伊斯兰教作为动员的工具。在武装斗争的口号和伊斯兰旗帜下,民族主义力量实现了最广泛的团结。改组后的民族解放阵线成为一个统一战线性质的组织,伊斯兰贤哲会等其他一些政党自行解散,加入民族解放阵线。经过8年的战争,阿尔及利亚人民历经坎坷,最终于1962年赢得独立,把民族主义斗争推向高潮。

民族主义道路的曲折发展

独立后,阿尔及利亚的民族主义继续向前发展,并呈现出较为鲜明的特点。

(一) 空洞的民族主义: 政治高于一切

由于民族解放阵线在战时的领导作用,致使独立后其主张必然上升为国家意志。同时,民族解放运动激发起来的爱国热情,也使宗教与民族的光辉黯然失色,宗教与民族情感随之降到次要

^① 参见金宜久、吴云贵著:《伊斯兰与国际热点》,东方出版社2001年版,第182页。

^② Adeel Dawisha, *Arab Nationalism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From Triumph to Despair*,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307.

^③ 参见王逸舟著:《当代国际政治析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版,第223页。

^④ 参见吴云贵、周燮藩著:前引书,第224页。

地位。特别是经历了130多年的民族屈辱,阿尔及利亚人认识到了建设富强的现代民族国家的迫切性。所以,当胜利沿着它的轨道向前发展的时候,阿尔及利亚就以国家民族主义精英们的意识形态建构新生政权。以本·贝拉为首的领导人进行了激进的改革,把社会主义的内容写进了宪法,世俗主义遂成为国家实际的指导原则。国家民族主义的主张体现了阿尔及利亚人想要摆脱贫困落后状态的急切愿望。

由于在独立战争中伊斯兰民族主义发挥了凝聚大众心理的文化功能,同时由于它对政治的冷漠,形成一种奇特的宗教与国家关系。随着斗争的胜利和政权的建立,这种关系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得以固定化。独立初期国家民族主义表现出激进的世俗化倾向,无视宗教赖以生存的文化价值,人为地凸显了现代与传统的尖锐对立。如1964年本·贝拉在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首届大会上的报告中对社会主义所作的世俗的解释,就远远超出了阿尔及利亚穆斯林的认识水平和心理承受能力。他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广泛认同使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愈益世俗化,遭到传统观念很强的宗教界的厌恶和抵制。¹结果,1965年6月,布迈丁发动政变,用强制性手段完成国家民族主义过激行为的最后缓冲,重新审视国家与宗教的关系。布迈丁时期,国家用功利主义的观点引导伊斯兰教服务于阿拉伯社会主义的大目标,“阿尔及利亚的阿拉伯社会主义国家在宪法中以伊斯兰的保护膜使其存在合法化”^④,国家加强对宗教活动的指导、协调和管理,使它服从于国家的宗教文化政策,实际上完成了宗教的国有化。就个人而言,伊斯兰仍是构成身份的决定性因素,但它也只是停留在那个水平上。^⑤由于国家经济的发展,人们对经济建设表现出更大的热情,宗教因此倍受冷落。国家“接收”宗教后,也对宗教给予一定程度的关注,以满足宗教界的基本要求。于是,国家羽翼庇护下的宗教有了坚实的物质保障,宗教与国家的关系比较和谐,宗教界只是对现代化导致的背离伊斯兰教的社会道德问题提出某些批评。

当国家的目光超越地域的界限去探寻更广阔的生存空间时,由于地理、语言、民族和宗教等方面的亲切感,宗教界便把对政治秩序的理念和

政治注意力转向阿拉伯世界。由于强烈的民族情感的推动,阿拉伯民族主义有时甚至成为外交政策的指导原则。独立伊始,阿尔及利亚就宣布采取与各个阿拉伯国家一致的立场,即不承认以色列存在的合法性,主张武力解决阿以问题,本·贝拉甚至想派约10万士兵去解放巴勒斯坦。布迈丁时期更加致力于阿拉伯民族事业,特别是1967年“六五”战争期间,阿尔及利亚也派兵参加。第四次中东战争期间,埃及为其囊中羞涩而苦恼时,布迈丁向埃及提供贷款,并亲自飞赴莫斯科购置了2亿美元的武器,民族情感之强烈可见一斑。1978年《戴维营协议》签订后,阿尔及利亚等国组成抵制阵线严厉批评埃及,并支持阿盟对埃及的制裁。当然,应当指出的是,阿尔及利亚热心于阿拉伯民族利益,一方面是为了表达广大民众的民族情感,并维护自身统治的合法性;另一方面也是试图通过这种激进的政策树立自己在阿拉伯世界中的威望,以图在阿拉伯政治中取得中心地位。这样,国家将宗教与民族情感置于政治框架内思考,构建出在政治压抑下空洞的民族主义外壳。

(二) 民族主义的危机: 国家政治的崩溃

布迈丁时代结束后,在军队的干预下,阿尔及利亚平息了接班人的危机,沙德利成为总统和民族解放阵线总书记。但经济的崩溃、政治的腐败,以及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冲击引起了社会的普遍不满。加之1981年底民阵中央委员会重申国家公职人员须是民阵党员,并解散所有群众组织,使得民众要求改革现状和参与政治的呼声日益强烈。正如美国学者亨廷顿所言:“一旦群众被领出洞穴,就不可能再剥夺他们享受阳光的权利。”^⑥因为民众表达政治意见的话语权一旦被剥夺,国家不再成为认同的基础,国家的合法性便会受到质疑,国家权利也要面对挑战。“经济

¹ 参见吴云贵、周燮藩著:前引书,第225页。

^④ [美国]埃斯波西托著;东方晓等译:《伊斯兰威胁:神话还是现实?》,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15页。

^⑤ See Adeed. Dawisha, op. cit., p. 278.

^⑥ 塞缪尔·P·亨廷顿著;王冠华等译:《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281页。

与政治（权利）的剥夺使人们倾向于伊斯兰教。”¹ 伊斯兰复兴被群众要求变革的呼声赋予了政治的使命。正是在这种社会危机的背景下，一个由众多集团组成的联合阵线——伊斯兰拯救阵线作为政治行动者而出现，并获得合法性和信誉。^④ 实际上，伊斯兰组织主要是针对政府的世俗化和西方化，以及对宗教的背离提出了批评，其纲领和要求也只是一般性原则，是政府的高压迫使民众运用宗教进行思考。在1990年首轮选举中，伊斯兰拯救阵线以65%的得票率获胜，仅差一步就登上权力之巅。伊斯兰拯救阵线对选举程序的突破令执政者手足无措，各种措施陆续实施，但全然不能阻止伊斯兰拯救阵线获胜的势头。于是，军队干预了政治，总统被迫辞职，伊斯兰拯救阵线被取缔，国家进入紧急状态。“政治伊斯兰构成对国家的挑战，但它带来的不是它所承诺的新秩序，而是混乱和无序。”^⑤ 伊斯兰激进分子组成反政府武装，国家陷入内战。

国家面临的深重危机，迫使民众用一种内向型思维去思考阿拉伯民族的共同事业，当国家日益丧失广泛的认同，宗教极端分子不断加剧人民的苦难时，对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认同也不过是作为减轻体内痛苦的工具，对更多的人来说，此时对阿拉伯共同声音的呼吁无疑是一种不合时宜的论调。因此，在处理阿拉伯国家间的关系上，他们相信是地理因素构成了阿拉伯国家间政治秩序的真正基础，阿尔及利亚与摩洛哥和突尼斯由于地理相近，以及为了寻求安全与政治合作组成阿拉伯马格里布联盟就是例证。当对社会内部痼疾的恐慌超过对民族事业的狂热，外部异质力量对阿拉伯地区的侵蚀和干预减弱，以及使国家改变生存环境的愿望不太强烈时，作为民族国家出现的阿尔及利亚与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利益矛盾便会凸显。这就是为何此时我们会经常听到阿尔及利亚发出的“阿拉伯民族共同呼声”，而很少看到它的“阿拉伯民族共同行动”的原因。

国家将所有问题政治化的保守倾向最终通过政治方式表现出来，阿尔及利亚试图在宗教、民族和国家的认同中寻找出路，但前景一片茫然。

（三）民族主义的重建：国家的政治改革

1995~1998年泽鲁阿勒总统开始进行调整，为国家恢复秩序与改革做了过渡性准备。在

1999年提前举行的大选中，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参加竞选的布特弗利卡当选为总统。他务实地处理民族问题，着重强调民族团结与民族和解的重要性，结束暴力，重铸民族凝聚力成为国家政治的首要目标。为此政府提出了全国和解的法律草案，并经全民投票通过了《民族和解法》。“反政府的伊斯兰武装放下武器，表示与政府合作，曾经在议会选举中稳操胜券的宗教政治势力也接受了布特弗利卡的领导。”^⑥ 此外，他还实施了一系列灵活的经济、社会改革措施，以促进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阿尔及利亚经过多年的政治混乱及伊斯兰复兴运动对政治的冲击，当前维护和平与稳定必然要强化国家职能，同时也要实现政治多元化，让不同的声音通过合法的途径得到表达。

这一时期的阿拉伯民族主义作为对阿拉伯民族心理的关照，其文化内涵仍将存在。特别是一直以冲突形式存在的巴以问题，或许最能唤起当前阿拉伯人共同的民族情感。在巴以问题上，阿尔及利亚表现出强烈的民族立场。布特弗利卡坚持公正、合理地解决巴勒斯坦问题是阿以建交的必要条件，并一直援助巴勒斯坦。如果任何一方对这一原则问题采取强硬态度，都可能导致两国关系陷入僵局。即便如此，阿尔及利亚参与民族事务动机的纯洁性仍受到怀疑。阿尔及利亚对以色列的关系由于实际利益的推动，也出现了缓和的倾向，1999年7月，在摩洛哥国王侯赛因二世的葬礼上，布特弗利卡总统与以色列总理巴拉克公开握手会谈，更是在两国关系上的突破。但不论初衷和目的如何复杂，阿拉伯民族情感被纳入国家意识形态却是不争的事实，在维护阿拉伯民族利益的讲台上，仍将听到来自阿尔及利亚的声音。

布特弗利卡执政以来，宗教、民族和国家在改革中平静地融合，人们看不到民族主义的激情

¹ Heather Deegan, *THIRD WORLDS: The politics of the Middle East and Africa*, London and New York, 1996, p. 76.

^④ 参见[美国]埃斯波西托著；东方晓等译：前引书，第217页。

^⑤ Bassam Tibi, *Arab nationalism: between Islam and the nation-state*,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7, p. 233

^⑥ 参见赵慧杰：《布特弗利卡执政方略浅析》，载《西亚非洲》，2005年第3期，第32页。

澎湃,只是感觉到它奔流向前的沉稳力量。

民族主义道路的发展趋势

阿尔及利亚的民族主义是伴随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而产生和发展的,由于宗教、民族、国家与民族主义结合的具体时间不同,导致其执行方式的不同,各自的本质内涵也不相同。在长期的民族独立斗争中,宗教、民族和国家三者间形成了一种特殊关系。宗教民族主义虽然最先产生,但由于长期的殖民统治对伊斯兰政治欲求的压抑,加之本身的文化属性,形成了独立后宗教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相对超脱,只是在社会变革的动荡时刻凸显出对社会不公、道德堕落的关注与批判。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斗争本质上是理想主义的,它们从复兴阿拉伯民族的尊严出发,强调阿拉伯民族团结斗争的必要性,在宣扬民族同质性的同时,却忽视了阿尔及利亚由于地理阻隔,特别是自奥斯曼帝国以来与阿拉伯半岛地区阿拉伯人历史和文化的差异,结果在实际斗争中难以取得广泛的认同。纵观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运动史,泛民族主义的政治诉求,虽然有时表现为非理性的民族狂热,但更多的则表现为对国家利益的追逐。国家民族主义者凭借独立战争中的领导地位,在独立后的权利分配中居于主导地位,并经常运用政治动员的方式,把民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积聚起来的力量尽情释放。这就易使国家决策者产生对非理性手段的迷信,导致民众对国家非理性的认同。当成功铸就的光环不再闪耀时,国家民族主义常常由于缺乏实质性内涵而成为一个空洞符号。“随着时间的流逝和环境的变化,一些具体特性可能成为人们效忠的焦点,而其他特性将被边缘化,甚至被排除。”¹阿尔及利亚的宗教、民族和国家三者间的这种关系,在一定时期内仍将影响和制约其政治发展的进程。但从另一方面看,随着国际形势和国内情况的发展变化,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在未来发展过程中也会有一些必要的调整和转型,发生一些相应变化,从而呈现出以下发展趋势。

(一) 民族主义的实质性内容将更加充实

长期以来,阿尔及利亚宗教、民族和国家的认同内容只包含对独特的文化形态或独立的国家

主权方面的抽象。“民族主义者仅通过推理或沉思防卫与国家相关的每一件事。它认为国家以外的任何事都是异质的和可鄙的,对与错成了无意义的概念。”^④它建构了一个与外部有别的外壳,而不注重对内部实质内容的填充。国家被动的政策和伊斯兰势力的崛起都未对此给予肯定的回答。在新时期为应对长期内战造成的复杂局面所推行的改革中,布特弗利卡允许宗教势力组成政党参政议政,并允许宗教组织开展社会活动,同时,强调政治民主化和尊重公民信念,维护公民合法权益,布特弗利卡向媒体表示,“未来的阿尔及利亚将逐步走向民主,走向法制”^⑤。2004年4月在政府未来五年工作计划中提出改进国家服务职能,进一步深化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领域的改革。当然,一切努力也只是改革的开始,承载着现代化重任的民族主义更需要一个具有创造性的建构过程,完成对共同体生存方式,社会制度和价值体系的实质性内容的填充。基于现实,这种填充必须以国家为主导,并融入宗教和民族等传统文化价值和民主与法制等现代社会的公共元素,以增强民族主义对于变化的适应能力。

(二) 民族主义关注的焦点将由政治转向经济

政治斗争是民族主义的主要内容,但远不是其全部内容,民族独立与发展必然要求由革命到建设的目标转移。阿尔及利亚独立后取得的成就非但没有完成国家民族主义目标的转移,反而强化了国家行为的政治色彩,在国际舞台上阿尔及利亚也是作为第三世界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出现的。正是由于对经济问题政治化,导致阿尔及利亚在政治运动中受到更大的冲击。因此,在当前阿尔及利亚新的民族整合时期,除了强调政治上的民族和解外,加强经济改革也是国家民族主义重构的内容。“例如,被认为在净化文化与政治权力方面具有优越性的伊斯兰拯救阵线,在1989年3月7日的纲领中也提出要求市场经济的

¹ Adeed. Dawisha, op. cit., p. 15.

^④ Dr. Ali Muhammad Naqavi, *Islam and Nationalism*, Published by: Islamic Propagation Organization, 1984, p. 67.

^⑤ 参见赵慧杰:《阿尔及利亚大选后的政治走向》,载《西亚非洲》,1999年第6期,第39页。

“经济条款”，“并主张出口导向型的增长方式”。¹ 2004年布特弗利卡在第二任期就职演说中则指出：“将继续致力于民族和解，进一步推进国家现代化，努力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制定和执行与阿尔及利亚远大民族目标相适应的社会文化政策。”^④ 布特弗利卡政府的双管齐下，为阿尔及利亚的发展带来了生机，相信在实现政治稳定后，对经济的关注必将超越对政治的留恋。

（三）民族主义的内涵将日益多元化

民族主义的产生往往有这样一种偏见：它要求认同独一，思想纯洁。在阿尔及利亚，宗教、民族和国家各自追求自己的认同基础，只是由于强大的外部压力，才将意识形态的差别用一种模糊的方式解决。独立后，国家民族主义居于主导地位，用政治的高压暂时平息了它们之间的分歧，国家以世俗的手段影响大众对民族和宗教的情感，但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阿尔及利亚发生的动荡造成国家空前的孤立，说明被影响的大众对这种国家行为的反感。因此，对阿尔及利亚来说，国家要想获得合法性，就必须适应社会

的需求，符合社会的标准，并得到社会的认同。国家要改变对宗教的功利主义态度，作为本土文化的一部分，将宗教对政治生活的影响规范化。同时改变自己在阿拉伯世界中的僵硬形象，处理民族问题时更加体现“缓和与合作”的精神。布特弗利卡号召全体阿尔及利亚国民不论属于何种政治倾向，都要致力于国家的建设事业，就体现了这一点。因此，在国家仍居主导地位的情况下，要完成民族主义的重构，必然要对宗教和民族等问题的思考内化，充分反映社会多元化的现实。

（责任编辑：徐 拓 责任校对：赵 苹）

¹ Clement M. Henry and Robert Springborg, *Globaliza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Development in the Middle Eas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115-116

^④ 参见新华社阿尔及尔2004年4月19日讯，转引自赵慧杰：前引文，载《西亚非洲》，2005年第3期，第34页。

• 学术动态 •

“新时期非洲研究”学术讨论会 在南京大学举行

甄 峰* 姜忠尽** 周 敏***

4月9日，由南京大学非洲研究所主办、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与南京农业大学协办的“纪念新中国与非洲开启外交关系50周年暨迎接第三届“中非合作论坛学术研讨会”——“新时期非洲研究”在南京大学举行。在开幕式讲话中，南京大学党委书记、中国非洲问题研究会名誉会长洪银兴教授肯定了新的政策环境下非洲问题研究的重要性，强调整合跨学科资源，加大对非洲问题研究的力度。《北京周报》李建国副总编也认为非洲研究十分重要，提出对非洲研究要培养“非洲情结”。中国非洲问题研究会终身名誉会长张同铸教授则对南京大学的非洲研究寄予厚望，希望在此平台上作出更大成绩。

本次研讨会与会专家、学者共30余位，分别来自教育部国际交流与合作司、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周报、南京

大学、南京农业大学等。与会者就目前关注的非洲国际政治、全球化、人口、资源、乡村发展、城市化、文化、教育、旅游等多个专题进行了研讨。此次学术讨论会收录会议论文22篇，展示了南京大学及国内主要非洲研究机构的最新成果。

（责任编辑：安春英 责任校对：赵 苹）

* 本文整理者甄峰系南京大学城市与资源学系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教授、南京大学非洲研究所所长。

** 本文整理者姜忠尽系南京大学城市与资源学系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教授、中国非洲问题研究会常务副会长。

*** 本文整理者周敏系南京大学非洲研究所研究生。